

地緣強權夾縫中的捷克—— 國際現實與務實下的生存之道

鄭得興

東吳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

摘要

捷克人的小國生存之道首先是因為他們能夠順從其歷史性格，而等待其歷史契機，捷克人一直在等待每個歷史發展機會，當危機來臨時，捷克人知道無需硬碰硬去鬥個你死我活，因為捷克文化的根紮得很深，只要文化不滅，民族就會長存。本文探討重點有三：首先，捷克在近代中東歐地緣政治的架構下，相對是個小國，但捷克為何能突破種種歷史困境而生存下來，並且求得發展？其次，捷克的小國生存之道，以捷克自身視角觀之，有何理論根據？第三，捷克的小國生存之道，能給台灣什麼啟發？筆者認為捷克的生存或立國之道，主要有三：其一，重視民族文化、其二，掌握歷史契機、其三、強調務實主義。捷克人的理想是置於務實主義的脈絡下，小國生存之道是先求生存，再求發展。從捷克的小國生存之道來看，台灣或許應該多思考務實主義的可能性，而非僅限於理想主義與現實主義。

關鍵詞：捷克、中東歐、地緣政治、務實主義、理想主義、現實主義

壹、前言

捷克歷史上(19世紀末)位處德意志帝國、奧匈帝國及沙俄帝國之間，雖擁有歐洲絕佳的地緣位置，卻注定了捷克民族無法自主命運幾百年。捷克深受歐洲地緣政治影響，儘管一次大戰後獨立成國，20世紀仍深受地緣強權欺凌。捷克不是大國，卻也不是絕對的小國，在傳統地緣政治架構下，大國小國取決於周邊國家的相對實力。捷克在12-14世紀曾經是區域強權，14世紀的查理四世不可一世，布拉格曾是神聖羅馬帝國首都。15世紀的捷克王國起伏於宗教改革，儘管胡斯的「真理勝利」深烙在捷克民族精神當中，終究不敵捷克貴族議會為其自身利益，而於1526年決議由奧地利哈布斯堡王朝接管波希米亞，16世紀演變成捷克胡斯教派與奧地利天主教的鬥爭局面，結局是捷克貴族兵敗於1620年的白山之役(Agnew, 2004)。捷克淪為奧地利統治版圖下的地方行政區，胡斯宗教改革思想與教派被徹底清洗出去，捷克民族被奧地利日耳曼人絕對統治長達三百年。18世紀之後，波希米亞基本上是普魯士與奧地利的緩衝地帶，普奧多次衝突地點發生在捷克境內(Polisensky, 1991; Wandycz, 1992; Harna & Rudolf, 1998)。捷克民族無法改變其歷史宿命，卻在其中逐漸形塑了其歷史性格。

波希米亞的歷史疆域是由捷克及日耳曼民族所共同營造，從10世紀起的捷克地緣歷史即與北方的薩克森王國多所折衝，14世紀查理四世的神聖羅馬帝國讓波希米亞成為日耳曼人的另一生存國度，17世紀之後的波希米亞相當於奧地利的準殖民地。1918年捷克考慮地緣政治作用，而與斯洛伐克民族共組國家，當初捷克斯洛伐克民主共和國的人口數大約為1,100萬人，捷克人600萬，斯洛伐克人200萬，日耳曼人300萬(Berend, 2003)。大部份日耳曼人位居在波希米亞與德奧邊境，這埋下了1938年『慕尼黑協定』中，西方列強不顧捷克歷史事實，而強制捷克割地止戰。希特勒1939年取得捷克之後，即刻揮軍北上攻打波蘭，開啟二次大戰序幕(Brodský, 2001)。1945年二戰尾聲，蘇聯紅軍解放捷克東部領土，美軍強佔卡洛維瓦利(Karlovy Vary)、皮爾森(Plzen)、及百威城(Ceske Budejovice)等捷克西部地區。最後美蘇妥協結果，美國撤退，而蘇聯影響力進入捷克，改

變了捷克幾乎千年來與日耳曼民族共處的地緣文化。

中東歐地區在近代歐洲地緣歷史中，基本情勢是四方列強（德奧土俄）的緩衝區及爭奪區，尤其是日耳曼民族及斯拉夫民族的生存對抗。二戰結束後，美國利益暫時取代了德意志，在冷戰結構中以自由主義對抗蘇聯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基本格局是大斯拉夫主義的東歐對抗（西）歐美。冷戰並未改變中東歐傳統二元對峙的國際結構，只是暫時改由美國來擔任與蘇聯抗衡的角色。冷戰結束後，德國挾其歐盟的主導性影響力，再次回歸中東歐。政治上透過歐盟東擴，經濟上透過德國外資，德國放棄武力征服中東歐，但卻以政經軟實力再次進入中東歐。蘇聯贏了熱戰，卻輸了冷戰。西方國家透過新自由主義的全球化，以市場自由化與經濟成長率的訴求推倒了柏林圍牆，卻也讓中東歐國家再反思如何在地緣強權夾縫中圖生存。

捷克是斯拉夫民族國家，但在過去千百年歷史中，主要地緣交手對象都是日耳曼民族，甚至捷克被納入了以日耳曼民族為主的神聖羅馬帝國疆域內。18世紀前半葉奧地利泰瑞莎女王在捷克透過義務教育來推行日耳曼化政策，不過捷克貴族的日耳曼化更早在17世紀就已開展。19世紀普魯士統一德國的過程，積極建構德意志民族主義，同時帶動了中東歐各民族的獨立意識，普魯士成功擊敗法國，並在1871年成立了德意志第二帝國，卻也鼓舞了中東歐地區各民族反抗德奧，並脫離德奧獨立建國。本文探討重點有三：首先，捷克在近代中東歐地緣政治的架構下，相對是個小國，但捷克為何能突破種種歷史困境而生存下來，並且求得發展？其次，捷克的小國生存之道，以捷克自身視角觀之，有何理論根據？第三，捷克的小國生存之道，能給台灣什麼啟發？筆者認為捷克的生存或立國之道，主要有三：其一，重視民族文化、其二，掌握歷史契機、其三、強調務實主義。

貳、歷史契機與歷史性格

大國與小國如何區辨？又何謂「國家生存」？捷克的國土面積大約為7萬8千平方公里，在28個歐盟國家中位居21，比愛爾蘭（7萬平方公里）、波羅的海三國、及荷比盧國土面積大（Wikipedia, 2017）。捷克總人口數為

10,464,000 人，在歐盟國家中名列 12，與葡萄牙 (10,599,000 人) 相當，比瑞典 (9,577,600 人) 及奧地利 (8,440,700 人) 多。以 GDP 來看，捷克 205,658 (百萬美元)，在歐盟國家中排序 16，世界排序 51。如以人均 GDP 來比較，捷克的 19,583 美元僅位居歐盟國家第 20，世界排名 42，落後於西歐國家。如僅以中東歐國家來看¹，以國土面積而言，捷克為第五大，前四大為波蘭、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及匈牙利。以人口數而言，捷克為第三大，前二大為波蘭與羅馬尼亞。以 GDP 而言，捷克為第三大，同樣在波蘭與羅馬尼亞之後。

以人均 GDP 而言，捷克為第三大，落後於斯洛文尼亞、及愛沙尼亞 (以上為 2015 年的資料)，目前中東歐許多國家都與德國有高度的政治經濟依存關係。捷克有四個鄰國，分別是德國、奧地利、斯洛伐克及波蘭，西半部是與傳統日耳曼關係的連結，捷克仍是受制於德奧的地緣政治與經濟關係的影響。德國的國土面積、人口、GDP 及人均 GDP 的絕對值遠高於捷克，奧地利的國土面積與捷克相當，人口總數少於捷克，不過經濟實力遠高於捷克，GDP 與人均 GDP 皆是捷克的二倍以上。波蘭的國土面積與人口總數遠大於捷克，不過經濟實力與捷克伯仲間。就波蘭的國土面積與人口數而言，可稱為歐盟或中東歐地區的「大國」，但其經濟實力就遠不足稱以「大國」了。相對而言，捷克是屬於小國行列。

國家生存往往先考慮國家利益為前提，然而何謂「國家利益」，如以傳統地緣政治及現實主義的硬條件來審視，最重要者諸如經濟、軍事、國際政治影響力等。然而大國與小國的國家利益是不同的，小國主要圖生存，大國的國家利益往往是模糊的，大國利益常超乎本國生存之外，擴及對外的政治影響力。冷戰結束後，歐盟地區透過區域集體安全與經濟結盟的方式，使得歐盟地區的戰爭衝突性降到最低，國家的「存在」比較不成問題，重點在於國家「生計」與國家發展。17 世紀的普奧戰爭在波希米亞開打，奧地利戰敗，退出三國瓜分波蘭的局勢，將西里西亞工業地區割讓給普魯士。奧地利為發展工業而另以波希米亞作為替代區域，波希米亞因禍得福。

¹ 根據台灣外交部定義的中東歐國家為 17 國，中國大陸定義為 16 國，其中差別在科索沃。

18-19 世紀波希米亞的工業發展迅速，一次大戰結束後，捷克接收奧地利工業設施而成為世界工業強國，這是捷克的歷史契機。

捷克在奧地利取消波希米亞王國之後，作為一個奧地利統治下的地方行省，生存了二百多年。捷克民族與日耳曼民族共同生活已有數世紀之久，在非民族主義的年代裡，統治階級或封建貴族與人民的被統治感覺是很疏離的，人民做為封建主的財產組成部分，被誰統治或管理基本上差異不大。更何況自從奧地利統治波希米亞之後，由於奧地利力推開明專制的統治策略，力圖鞏固奧地利哈布斯堡家族在歐洲的政治版圖，於是波希米亞歷經了工業化與現代化的轉型，城市設計、交通規劃及工業經濟等大幅進步（Coser, 1991）。現代官僚體系引入波希米亞後，波希米亞成為奧地利統治版圖中成績最亮眼的地區。捷克在異族統治中，社會各方面有了長足的進步，這情況不同於其他中東歐地區被統治的民族，因此捷克民族在被異族統治的歷史中，從某種意義言之，是個獲利者。

捷克在奧地利日耳曼民族統治三、四百年期間，儘管奧地利並未將捷克人真正日耳曼化成「奧地利人」，但捷克的民族性格裡卻充滿著日耳曼特質，這種特質是經過長久歷史所形塑的，這種捷克人的「歷史性格」不同於其他斯拉夫民族，因為捷克人的歷史際遇不同於波蘭、斯洛伐克及其他南斯拉夫各族。捷克人的「歷史性格」是一種務實（pragmatic），而非現實主義（realism）取向。捷克位處歐洲心臟位置，是兵家必爭之地，15 世紀以後的捷克人無法像其祖宗一樣發揚國威，甚至連守土都有問題。波希米亞 16 世紀落入奧地利哈布斯堡家族，不過捷克民族相對幸運的是擁有「歷史契機」（historical opportunity），奧地利將波希米亞建設成一個工業文明地區。捷克民族看待過去的歷史是採取一種包容態度，捷克人認為奧地利統治的歷史是有機連結在捷克過去的軌跡上，因此奧地利的皇帝就是捷克人的皇帝，這是捷克歷史的事實，即使在民族復興運動時代，捷克的認同並非建構在去日耳曼化與去奧地利化之上，而是將奧地利統治的成果轉為捷克民族所用（Hampl, et al., 2007; Jenkins, 2009）。

捷克民族主義發源於 18 世紀末，19 世紀是重要的發展階段，捷克在 20 世紀初是以奧匈帝國統治下的子民而參戰對抗俄國，但奧匈帝國戰敗卻

成為捷克民族的重要歷史契機。並未積極參戰的捷克民族，在戰敗後卻獲得國家獨立的獎勵。19 世紀捷克的民族利益 (national interest)，在 20 世紀初建國之後就轉為民族國家利益 (nation-state interest)，民族-國家的利益訴求轉換在於，民族主義是帶有歐洲 19 世紀浪漫主義色彩的理想 (Gellner, 2001; Anderson, 2010)，國家利益是建構在現實主義之上，因為後來國際現實證明了威爾遜主義的理想是靠不住的。因此，捷克首先與斯洛伐克談共組國家，因為地緣政治未曾消失在歐洲的地緣政治上，捷克斯洛伐克民主共和國確實看起來比較強大。這個新興民主共和政體取消王權封建體制，改採國會與內閣共和制，對外以總統為國家元首。經濟上接收了奧地利的工業設施，成為世界工業強國。捷克第一共和在馬薩里克總統的治理之下，波希米亞地區是歐洲繁榮昌盛之地。這段期間維持了 20 年 (1918-38)，在英法對納粹德國的綏靖政策之下，捷克被出賣了 (Dowling, 2002; Panek & Tuma, 2009)。20 世紀捷克民族的「歷史性格」不斷被刻劃，最後形塑了一個儘管已加入了歐盟，但卻是歐盟內最著名的「歐洲懷疑論」國家 (Rieck, 2007)。國際現實形塑了捷克的務實性格，捷克不堅守理想主義，也不遷就現實主義，而是尋求能夠適應自己生存的框架。

捷克在歷史上有幾個重要節點或歷史契機，主要都是沿著一個歷史主軸前進，亦即捷克民族總能適應自身歷史發展軌跡。捷克民族有種特殊的「歷史性格」，亦即捷克人能順勢而為，等待歷史時機成熟而自然產生成果。捷克民族不像波蘭人那般的可歌可泣而敢於犧牲。捷克民族反而比較像哈謝克 (捷克作家) 筆下的「好兵帥克」，最後都有一種自然的歷史圓滿。因此，捷克的革命可以是和平理性的「絲絨革命」 (1989)，連捷克及斯洛伐克的分手也是皆大歡喜的「絲絨離婚」 (velvet divorce, 1993) (Innes, 2001; Čermáková & Holda, 2001; Whitefield, 2002; Nedelsky, 2004)。1968 年的布拉格之春，20 萬捷克大軍在營休假，靜觀其變，因為抵抗蘇聯可能是徒勞無功 (Leff, 1997)。就像波希米亞在歷史上能夠成為工業重點區域，主要是奧地利所賜給的禮物，這是奧地利經濟策略的選擇，而非捷克人特別高明所經營的結果。一次大戰捷克的獨立是因為其參戰失敗的結果，捷克的生存之道似乎在應證歷史的無為而治，捷克人總是以一種消極而被動

的生活態度來回應生存問題。對捷克這樣小的民族或國家而言，積極改變現勢是白費功夫的，反而是等待著歷史契機，而一旦有了變化之可能性，捷克民族很少沒把握住的，這是小國捷克的生存之道及智慧。

參、國際現實與捷克務實的生存之道

一、捷克小國生存之道的三種見解

1938年捷克斯洛伐克的總體戰力是足以跟希特勒德國一搏的，但『慕尼黑協定』讓捷克放棄武力對抗，這是國際現實讓地緣政治的外交結盟犧牲了捷克的國家利益，捷克選擇務實的生存之道，投降不抵抗。30年後的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第一書記杜布切克推行具人性主義的社會主義，自由化運動帶來的危險性引起蘇聯總書記布里茲涅夫極度關心，捷克在屢勸不聽的情況下，7萬多輛的蘇聯坦克車開進了捷克斯洛伐克，蘇聯鎮壓布拉格之春運動於是終結了捷克斯洛伐克人民追求自由的美夢（Musil, 2000）。捷克斯洛伐克的總體戰力是可以跟華沙公約組織入侵的軍力對抗的，但捷克領導人選擇投降不抵抗。國際現實對捷克不利的時候，捷克往往不會做「無謂」的犧牲，捷克民族選擇「保留」實力以待來日。

1938年及1968年的國際現實，嚴重損害捷克的國家利益，但捷克領導人的投降決定未必比抵抗決定來得容易，基本上所謂的捷克務實主義一直是其歷史性格一部分，因為伴隨著一次歷史危機之後，捷克民族相信就會有一次歷史契機。1938年的『慕尼黑協定』讓捷克在戰後以『貝奈斯條款』（*Benes Decree*）回擊德國，二戰後強制在捷克蘇德台地的二百多萬日耳曼人離開捷克。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的總人口數雖然下降了，但一勞永逸解決了長期以來國內的日耳曼人與斯拉夫的衝突（Hilde, 1999）。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遭鎮壓，1989年的絲絨革命推翻共產政權之後，20年期間「回歸正常化」的共產政權高壓統治（Kuus, 2004; Myant, & Smith, 2006），讓捷克在恢復民主共和體制之後，順利加入西方陣營，一勞永逸地解決捷克與俄羅斯之間的糾結關係，尤其2002年11月北約組織高峰會議首次選在

前共產國家舉行 (Faro, et al., 2003)。1999 年捷克加入北約組織、2004 年捷克加入歐盟、2007 年捷克加入申根條約，2009 年捷克擔任歐盟輪值主席國。捷克雖然回歸了歐洲，但捷克不希望歐盟成為繼德俄之後，成為欺壓捷克的新統治者。

捷克絲絨革命之後，捷克選舉哈維爾 (Vaclav Havel) 擔任總統 (1990-2002)，哈維爾是國際矚目的捷克政治明星，他的理想主義帶著捷克登上國際舞台，並獲得國際的高度肯定與尊敬。哈維爾是捷克的威爾遜，個人不願意組織政黨，期待做全民總統。提倡公民社會，擁護歐洲聯盟及區域整合，主張捷克的國際責任及推廣捷克的民主化經驗。哈維爾讓捷克的國際能見度提升不少，捷克人民以哈維爾這位文人總統為榮。相對於哈維爾的理想主義，曾擔任過捷克總理及接續哈維爾擔任捷克總統的克勞斯 (Vaclav Klaus)，其政治理念就如他所說的是務實主義，而非現實主義。克勞斯是歐盟有名的歐洲懷疑論者，歐盟在里斯本條約通過之前，原來的決策機制是全體會員國共識決，每個會員國都有投票權，不管是大國小國，票票等值 (Crawford, 2004)。克勞斯特別注意到歐盟每項條約與協議是否有傷害到小國主權及利益，克勞斯反對任何忽略小國利益的決定，尤其克勞斯積極捍衛捷克的國家利益，並經常對歐盟大國提出反駁意見，因此克勞斯在歐盟裡是有名的頭痛人物。克勞斯一樣讓捷克的國際能見度提高，只是相對於哈維爾的受歡迎，克勞斯讓捷克人民感覺到不那麼光彩。

克勞斯不認同歐盟整合的深化，他主張歐盟只要負責經濟市場規範即可，其他領域的規範不需要管太多，那些應該是國家利益的範疇。哈維爾與克勞斯是捷克民族二種不同典範的性格，捷克人高舉哈維爾的道德形象，欣賞他對捷克在國際上的加分效果。儘管哈維爾標示著從捷克歷史人物胡斯精神的一脈相傳，然而實際上更符合捷克民族的歷史性格應該是克勞斯！捷克小國的生存之道不在於國際上高談世界和平的理想，反而是像克勞斯般地如此謹慎固守小國利益是否被犧牲，這是捷克長期以來的歷史經驗，會出賣朋友的通常是盟國，1938 及 1968 年的教訓不遠。克勞斯的務實主義往往是自利主義 (egoism)，他不認為自己是現實主義，他反對地緣政治的聯盟外交政策，他反對軍備競賽與毫無實用性的政治及經濟作為。克勞

斯不受捷克知識份子的歡迎，捷克知識份子在脫離共產政權之後，大都希望能融入國際社會，並提升捷克的國際聲望，他們是哈維爾的擁護者。不過，克勞斯的主張基本上更契合捷克民族長期以來的生存之道。克勞斯以務實主義稱呼自己的主張，他也不排斥稱呼自己是務實的理想主義者或務實的現實主義者，總之務實比較重要，其他多是空想。

在克勞斯之後擔任捷克總統的是澤曼（Milos Zeman），2013年澤曼成功推動總統直接民選，他曾經是共產黨員，民主化之後他擔任過社會民主黨主席及捷克總理，他反對養老金改革及認為應該積極推經濟成長。他與克勞斯相處不好，不過在經濟理念上似乎相近，對國家利益的看法一致，他們都認同『貝奈斯條款』（*Benes Decree*），儘管當時造成二百多萬德國人被迫遷徙離開捷克境內，甚至造成二萬多人死亡，但是相對於1938年的『慕尼黑協定』，貝奈斯條款目前仍是捷克人民毫不猶豫所支持的法令。對於捍衛捷克的國家利益，澤曼與克勞斯的立場是一致的。澤曼的政治立場有從左轉右的傾向，他支持自由市場與經濟成長，因此與中國的關係走得很近，他認同中國一帶一路的政策，並積極加強與中國雙方的政治交往。相對於哈維爾的理想主義，克勞斯的務實主義，澤曼比較接近現實主義，也比較積極拉攏對他有利的國際關係，以上剛好透過民主化之後的三位捷克總統，來說明捷克小國生存之道的三種不同見解。

二、捷克小國生存之道的實務

捷克在後冷戰時代的經濟自由化及市場化趨勢下，基本上並未全然盲目服膺全球化機制的唯經濟成長論（Ignatieff, 1995），尤其有關於民族文化領域，更是被捷克人視為國家的核心利益。捷克的歷史證明民族及國家可以被異族統治，但惟有民族文化存在，民族復興才能指日可待。因此捷克的文化相關政策都會涉及國家利益，例如電影與文化資產保存等。捷克不僅立法保護本國電影事業，捷克人也相當支持本國電影的發展，捷克電影經常涉及歷史題材。捷克的文化資產保存有相當嚴格的規範，捷克有十二處聯合國世界文化遺產，捷克的觀光業相當發達，每年進入捷克的國外觀光客都在千萬人以上，觀光產值相當可觀。然而捷克對待文化資產的觀

念並非是以發展經濟為前提，亦非是為了保存古蹟作為自身目的，而是思考文化資產與常民生活的自然融合，文化資產如何提升人民的文化意識或民族情感，是為了人民生活品質而去保存與維護，而不是為了觀光客的消費。

捷克的社會情境教育是與人民的日常生活緊密結合的，捷克人的歷史意識是穿梭在街道名稱、廣場與雕像、建築與古蹟等的日常接觸中建構的，而不僅僅是來自課堂書本知識的灌輸（鄭得興，2008）。捷克對文化資產的保存不遺餘力，不輕易以發展經濟而損害文化資產，這是捷克小國深刻感受到文化是民族延伸的根柢，沒有文化根柢，民族可能很快就被併吞與消滅了。文化資產是歷史記憶傳承的重要載體，因此歷史意識是來自於人民日常生活中的接觸，歷史與人民的情感作用是緊密連結，是人們思維的有機組成（哈布瓦赫，2002）。人們對於國家認同是天經地義，自然而然地不假思索，不會有人質疑「我是捷克人」的內涵，因為經過這麼多歷史災難，證明捷克人就是波希米亞這塊地方的真正主人。歷史情境是相當重要的，如何將之自然融入社會各角落與鑲嵌在日常生活中，讓人們的歷史情感昇華為民族認同的框架，減少政治語言的人為操縱，捷克人民對歷史是有自豪感的。

另外，捷克人與日耳曼人的相處歷史相當久遠，捷克從德奧那裡學到了務實、效率及不投機。冷戰結束後，中東歐後共產國家的經濟面臨轉型，如何吸收外資是各國政府的當務之急。外資不僅提供中東歐國家普遍缺乏的資金外，更是帶進了最新及最現代化的管理及經營模式。2008 年歐洲金融危機，捷克受災的情況並不如其他中東歐國家嚴重，原因在於捷克人並不熱衷金錢遊戲。中東歐國家在冷戰後為吸收外資，過去的民族工業及大部份的金融業都可以讓渡給外資，捷克最大的國營事業速可達（Skoda）即轉售給德國福斯（Volkswagen）汽車公司。外資公司也往往因捷克人的務實性格及效率而將中東歐區域的商務中心或研發中心設立於此，捷克目前對選擇外資是有更多的考量，基本上污染性的製造業是不需要了。民族工業讓捷克在 19 世紀強化了民族自信，歷經共產時期對經濟發展的破壞，民主化後捷克的民族工業隨著全球化潮流，大都交給自由市場去操作，但是

工業根基都留在捷克境內，並未遷出。

肆、對台灣的啟發

捷克的地緣位置正處在西部日耳曼民族德奧二國及東部大斯拉夫民族的俄國之間，絕佳的地理位置讓捷克成為兵家必爭之地，但同時也因地緣位置的得天獨厚，而讓異族統治者投入資源建設。台灣的地緣位置介在中國大陸與日本之間，隔太平洋與美國遙對。台灣在日本統治下，也被建設成殖民地的模範樣板，這點得利於殖民統治的政治思維，台灣與捷克的情形有些類似。不過台灣與捷克的差異點，在於台灣的後殖民主義總是揮之不去，捷克已擁有真正的主體性。捷克的小國生存之道，或許可以提供台灣幾點啟發性思維：

- 一、重視歷史與生活的結合：捷克讓歷史與社會生活緊密結合，在人們的日常生活情境中，自然接觸歷史氛圍，這是透過公共空間的論述，營造在地發生的歷史真實感，例如歷史名人的軌跡、廣場的公共性、街道名稱的象徵符號、國家紀念日與紀念活動等，捷克政府在歷史區的整體營造論述是相當嚴謹的(Assman, 2008; 鄭得興、張家銘, 2013)。捷克人是生活在歷史社會之中，而不是之外。台灣人與歷史社會相隔太遙遠了，捷克人不為歷史而去學歷史，而是將自己置於歷史脈絡之中的自然感受與理解，台灣人把歷史與自己的生活疏離化了，把自己抽出在歷史脈絡之外，將之當成枯燥乏味的教科書文字背誦。台灣人的歷史意識與歷史情感相對薄弱，這點不利營造想像共同體。歷史情境教化作用，可以學學捷克的做法。
- 二、重視文化的移情作用：捷克非常重視文化資產的保存與維護，捷克有十二處世界文化遺產，並有為數很多的國家級及地方級的文化資產。首先，捷克人認為民族文化才是國家核心利益，國與家可以被佔領、被統治，但只要文化長存，民族就能長存，而國家最終可恢復獨立。因此文化資產的保存與維護，是要產生人民的民族情感，而非以發展經濟為目的。台灣文化部列有十八處的世界文化遺產潛力點，我們也

有文資法，我們有許多的國家古蹟等文物。不過，台灣過於重視文化觀光與文創產業的結果，讓文化成為經濟成長的重要工具資本，與強調其對 GDP 的貢獻，我們對文化的情感建構達不到民族作用的境界。捷克人民以自己的文化自豪，台灣人似乎總是以自己過去的經濟奇蹟為榮，文化產業的文化深根值得學習捷克，因為捷克人認為能讓小國真正生存下來的不是政治與經濟，而是文化。

- 三、國際現實下的務實主義：儘管捷克總統哈維爾的國際聲望很高，也為捷克贏得國際能見度，不過理想主義並非是捷克主要的歷史性格。反而是捷克總統克勞斯的務實主義比較接近捷克人的真實思維，他認為要先在顧好自己國家利益的前提之下，再談國際理想，小國的聲音必須要被尊重，否則就力爭到底。捷克在後共產時期也將其民主化經驗傳布到第三世界，也在其能力範圍內善盡國際責任，這都是捷克的務實主義下的理想。捷克克勞斯總統經常被視為自私的總統，不過利己主義更符合捷克的小國生存之道。台灣面對的國際現實是相當嚴峻的，或許可以好好研究捷克總統克勞斯的思想見解，至少他的反對行為也為捷克獲得更多的國際曝光率。克勞斯不認同結盟的有效性，結盟會讓小國產生依附關係，如何在各種國際力量間保持等距，這是由捷克歷史教訓所得出的經驗。
- 四、留住民族工業的根與土壤：捷克 19 世紀的民族工業對經濟民族主義起到重要作用，捷克斯可達 (Skoda) 兵工廠二戰前是世界第二大兵工廠。冷戰結束後，這間捷克最大的國營事業也轉手到德商經營，這是讓捷克國營事業發展更好的方法，但卻不會因此而讓捷克人失去對速可達的民族情感認同。因為速可達最大本營還是留在捷克，它的產品依然是捷克思維。民主化後捷克的經濟改革表面上是讓外資橫行無阻，實際上捷克重要產業仍生長在捷克土壤裡，在此基礎上再吸引更多外資的進入。台灣產業外移經常是連根拔起，除了追求經濟利潤之外，台灣似乎比較不在乎產業生長的根與土壤，數字管理取代人們集體記憶的特殊情感。捷克人可以在國外的路上很自豪地指出，速可達汽車是捷克人的驕傲。我們台灣人的驕傲在哪裡呢？

伍、結論

捷克小國生存之道的實務面向，具體掌握在幾點：國家安全上交給區域組織，如北約與歐盟，集體安全機制相對於大戰前的秘密外交聯盟是相對可靠。除基本安全無虞外，捷克民族更強調文化作用，文化是民族的根基，沒有文化就沒有民族，更無國家可言。捷克民族不會為了發展觀光經濟，而大幅改變人文地景。文化經濟是附加的產值，文化真正價值在於情境教化。捷克的國家認同是建立在歷史文化的框架上，而非政治與經濟成就。在經濟發展思維上，捷克民族具有日耳曼人的務實與效率，這是捷克在後冷戰時期經濟復甦最重要的資本。在國際政治上，捷克人比較屬於捷克總統克勞斯的務實主義，首重自己小國的事實，因此無需空言國際理想，小心翼翼保護自己的國家利益，先從利己主義出發，再延伸為利他主義，但必須在自己能力範圍之內。

捷克人的小國生存之道首先是因為他們能夠順從其歷史性格，而等待其歷史契機，捷克人是無為而治的等待每個歷史發展機會，當危機來臨時，捷克人知道無需硬碰硬去鬥個你死我活，因為捷克文化的根紮得很深，只要文化不滅，民族就會長存（鄭得興，2013）。其次，也是因為歷史經驗而讓捷克人變得非常務實，捷克人不太空談理想，很務實地尋求眼前問題的解決之道，跟捷克人交往的經驗是務實與效率，他們深受日耳曼精神影響。捷克人具有黑色幽默性格，捷克人過去一直處在異族統治，捷克人的生活哲學是寧願開自己的小玩笑，而不會去揶揄其他民族。捷克小民族的自尊心是建構在對自己文化的充分自信上，比如說投降比不投降的決定更痛苦，因此他們寧願當下選擇痛苦（投降），也不願讓後人痛苦（戰爭的破壞），因此保存下來了大量的歷史建築、文物與古蹟。這是捷克式的幽默，同時也是捷克人的處事態度。第三、捷克人對自己的工業傳統具有深厚民族情感，儘管民主化後捷克引進許多外資，同時也將國營事業民營化，並交由外資經營管理。不過，捷克產業很少會連根拔起出走，也很少讓外

資完全抹煞捷克企業的民族情感。「捷克人」是文化意涵，而非人口學概念。「我是捷克人」回答的是歷史認同問題，而非僅是事實。捷克的務實也表現在文化是民族的根，而非經濟賺錢的工具，因此文化資產保存的目的是在讓人們透過日常生活接觸中，連結民族歷史的情感作用，而非要一波波的觀光人潮創造經濟產值。

台灣或許在地緣政治與歷史情境與捷克相似，但捷克確實能夠提供台灣在民族主義及國族認同上的啟發式經驗。台灣過於強調經濟作用的國家生存之道，經濟奇蹟思維主導台灣人多年的自豪感，我們或許需要像捷克那樣以文化自豪，而非總是強調經濟發展的成就。台灣人的歷史意識不僅紛亂，而且薄弱。台灣的歷史存在於那些硬梆梆的教科書、博物館及導覽牌示裡，而不是在日常生活的語境與情境中，我們無法呼吸歷史的空氣，歷史離我們相當遙遠。捷克人的歷史就在身邊、每日的社會生活裡。捷克人的理想是置於務實主義的脈絡下，小國生存之道是先求生存，再求發展。從捷克的小國生存之道來看，台灣或許應該多思考務實主義的可能性，而非僅限於理想主義與現實主義。

參考文獻

- 哈布瓦赫·莫里斯（畢然、郭金華譯），2002。《論集體記憶》。中國上海：人民出版社。
- 鄭得興，2008。〈中東歐的公民社會與民主發展之比較研究〉《台灣國際研究季刊》4卷1期，頁67-98。
- 鄭得興，2013。〈中東歐國家之歷史遺緒與轉型正義—以捷克及斯洛伐克為例〉收於施正鋒（編）《轉型正義》頁191-211。台北：台灣國際研究學會。
- 鄭得興、張家銘，2013。〈國家認同差異性下之集體記憶框架—捷克及斯洛伐克分裂後的年輕世代〉《台灣國際研究季刊》9卷4期，頁115-41。
- Agnew, Hugh. 2004. *The Czechs and the Lands of the Bohemian Crown*. Stanford, Calif.: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 Anderson, Benedic（吳叡人譯），2010。《想像的共同體》。台北：時報出版。
- Assman, Aleida. 2008. “Transformations between History and Memory.” *Social Research*, No. 75, pp. 49-72.
- Berend, Ivan T. 2003. *History Derailed: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in the Long Nineteenth Centu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Brodský, Jiří. 2001. “The Czech Experience of Identity,” in Petr Drulák, ed. *National and European Identities in EU Enlargement: Views from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pp. 15-28. Pragu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 Čermáková, Zdena, and Dalibor Holda. 2001. “Changing Values among Czech Students before and after November 1989.” *European Journal of Education*, Vol. 27, No. 3, pp. 303-14.
- Coser, A. Lewis（孫立平等譯），1991。《社會衝突的功能》。台北：桂冠圖書。
- Crawford, Keith. 2004. “Czech President Václav Klaus: Euroskeptic or Eurorealist?” *New Presence*, Vol. 6, No. 3, pp. 25-26.
- Dowling, Maria. 2002. *Brief Histories: Czechoslovakia*. London: Arnold.
- Faro, Jeremy, Sara Binzer Hobolt, and Manja Lemencic. 2003. “Lost and Found: ‘New’ National Identities in the European Union.” *Cambridg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16, No. 2, pp. 203-205.
- Gellner, Ernest（李金梅等譯），2001。《國族與國族主義》。台北：聯經出版公司。
- Hampl, Martin, Petr Dostal, and Dusan Drbohlav. 2007. “Social and Cultural Geography in the Czech Republic: Under Pressures of Globalization and Post-Totalitarian Transformation.” *Social and Cultural Geography*, Vol. 8, No. 3, pp. 475-93.

- Harna, Josef, and Rudolf Fiser. 1998. *Dejiny Ceskych Zemi II* (捷克史第二冊). Prague: Fortuna.
- Hilde, Paal Sigurd. 1999. "Slovak Nationalism and the Break-up of Czechoslovakia", *Europe-Asia Studies*, Vol. 51, No. 4, pp. 647-65.
- Ignatieff, Michael. 1995. "On Civil Society: Why Eastern Europe's Revolutions Could Succeed." *Foreign Affairs*, Vol. 74, No. 2, pp. 128-36.
- Innes, Abby. 2001. *Czechoslovakia: The Short Goodby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Jenkins, Keith (賈士衡譯) 2009。《歷史的再思考》。台北：麥田出版。
- Kuus, Merje. 2004. "Europe's Eastern Expansion and the Reinscription of Otherness in East-Central Europe."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Vol. 28, No. 4, pp. 472-89.
- Leff, Carol Skalnik. 1997. *The Czech and Slovak Republics: Nation versus State*.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 Musil, Jiri. 2000. *The End of Czechoslovakia*. Budapest: 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Press.
- Myant, Martin, and Simon Smith. 2006. "Regional Development and Post-Communist Politics in a Czech Region." *Europe-Asia Studies*, Vol. 58, No. 2, pp. 147-68.
- Nedelsky, Nadya. 2004. "Divergent Responses to a Common Past: Transitional Justice in the Czech Republic and Slovakia." *Theory and Society*, Vol. 33, No. 1, pp. 65-115
- Panek, Jaroslav, and Oldrich Tuma. 2009. *A History of the Czech Lands*. Prague: Karolinum Press.
- Polisensky, J. V. 1991. *History of Czechoslovakia in Outline*. Prague: Bohemia International.
- Rieck, Christian E. 2007. "Co je Evropa?" *Střední Evropa*. Prague: Institut Pro Středoevropskou Kulturu a Politiku.
- Wandycz, Piotr S. 1992. *The Price of Freedom: A History of East Central Europe from the Middle Ages to the Present*. London: Routledge.
- Whitefield, Stephen. 2002. "Political Cleavages and Post-Communist Politics." *Annual Review Political Science*, Vol. 5, pp. 181-200.
- Wikipedia. 2017. "List of European Countries by Area." (https://en.wikipedia.org/wiki/List_of_European_countries_by_area) (2017/6/22)

The Czech Existence in the Crevice of the Geopolitical Power: International Realism and Pragmatism

Ter-Hsing (James) Cheng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Soochow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Abstract

The first and foremost reason for the survival of the Czechs is that they can conform to their historical character, while waiting for the historical opportunity; that is, the Czechs have been waiting every opportunity for historical development. The Czechs know no need to fight a battle, when the crisis comes, because the roots of the Czech culture were so deep that the nation would endure as long as the culture did not die.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ree main questions: first, the Czech Republic in moder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under the framework of geopolitics, relatively a small country, but why the Czech Republic can break through the various historical difficulties and survive and develop? Secondly, what is the theoretical basis of the Czech own viewpoint for the survival of such a small country? Thirdly, what is the inspiration for Taiwan from the lesson of the Czech survival? The author thinks that at least three main points to narrate the existence of the Czech survival, first, understanding the importance of national culture; secondly, holding on the historical opportunity; thirdly, emphasizing pragmatism. The author states that the Czech people's ideals are placed in a pragmatic context, the small country is to try survival first, and then to seek develop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survival of the small Czech Republic, Taiwan may need to think more about the possibility of pragmatism than about idealism and realism.

Keywords: Czech Republic,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geopolitics, pragmatism, idealism, realism

